

大足学研究文丛·大足学讲堂

第11辑

◎ 主编 秦臻

理论、方法与实践 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

大足石刻与大足学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大足石刻 黎方银
大足学的构建与实践 王天祥
从敦煌学的发展看大足学的建构 龙 红

石窟寺艺术与美术考古

中国佛教艺术源流概述 李裕群
西藏西部的佛教美术 霍 巍
巴蜀唐代佛教造像与长安样式 罗世平
石雕工匠书写的艺术史 秦 臻
复古与地区创新 魏离雅
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的地域特征 苏 奎

田野实践与方法

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理论和方法 雷玉华
佛教考古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于 春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大足学研究文丛·大足学讲堂

第11卷

◎ 主编 秦臻

理论、方法与实践

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方法与实践: 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 / 秦臻

主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10

(大足学讲堂)

ISBN 978-7-5624-8583-4

I. ①理… II. ①秦… III. ①美术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9.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8913号

大足学讲堂

理论、方法与实践——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

lilun fangfa yu shijian——meisu kaogu yu dazuxue yanjiu

秦臻主编

策划编辑 张菱芷

责任编辑: 张菱芷 版式设计: 张菱芷

责任校对: 谢芳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314千 插页: 16开4页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583-4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大足学研究文丛》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罗中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祥 刘贤高 李裕群

庞茂琨 罗世平 秦 臻

雷玉华 黎方银 霍 巍



总序

传承千载的文化遗产瑰宝大足石刻与四川美术学院的缘分可谓不浅。20世纪50年代，作为建国后大足石刻研究史上的第一个春天，我校雕塑系教授李已生、王官乙等先生已多次徒步往来于大足石刻，每忆起当年条件之恶劣，总会为先生们艰苦卓绝、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所感动；60年代，享誉海内外的雕塑巨制《收租院》亦从大足石刻受益颇多；几十年来，川美师生对大足石刻的考察、研究繁不胜计。目前，大足石刻研究日益为学界所瞩目，发展为以研究大足地区为中心、以巴渝文化遗产和巴蜀石刻为主体、覆盖南方石质文物保护的一门学问。2014年，四川美术学院与大足区人民政府共建大足学研究中心，促使我校与大足石刻60余年的相交、相知步入一个新的高峰。中心以促进文化传承、推动文化创新为宗旨，以培养大足学研究人才、搭建国内外大足学研究平台为主要任务，不仅是大足学建构和发展的重要策源地、科研和教学的主体单位和组织者，同时也将成为我校特色学科建设和教学实践改革的重要阵地，对大足石刻研究和我校教学实践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大足学研究文丛》出版的目的，正在于建构学科基础，搭建学术研究平台，汇聚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广大学人提供一份有益于拓宽人文视野富有质量的精神养料。

是为序。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院长

罗中立教授

前言

努力集聚跬步 以期能致千里

大足石刻是巴蜀石刻的杰出代表，也是海内外石刻研究优秀成果汇聚的重要平台。20 世纪 40 年代，大足石刻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即享有“从中国雕刻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以为堪与云岗，龙门鼎足立，而为中国佛教石刻之三大区域”；“实与敦煌相伯仲”之美誉。世纪之交，随着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开始逐步形成以研究大足地区石刻造像为中心、以巴渝文化遗产和巴蜀石刻为主体、覆盖南方石质文物保护的一门学问“大足学”。

一门新学问的诞生，往往依托于新研究对象的被发现与重视；一门新学问的成长壮大，则取决于新对象是否足以支撑该学科的涵盖领域和发展后劲。大足学研究从广受关注的“学问之学”能够顺利发展为具有自身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学科之学”，首要任务便是应该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等问题上对大足学的构建做出清晰的回应。正如库恩（TS. Kuhn）指出：“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至少有一个学科范式。实际通常是在一个学科中有若干相互竞争的学科范式。每个学科范式都有自己确定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学术评价体系、典范的培养体系与工作体系。”（T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有鉴于此，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初首先推行的举措之一，即是举办系列讲座，通过邀请校内外各方专家、学者介绍其研究成果、学术心得。演讲嘉宾不仅有已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也有初涉学术研究的青年学人；演讲主题既有基于基本理论与学科构建的探讨，也有研究方法与工作实践的积极探索。

本辑《大足学讲堂》收录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中心 2013 年度所举办的一部分学术讲座共计 11 篇，具体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第一部分“大足石刻与大足学”基于学术史梳理与学科构建等基础理论问题。有对大足石刻文化背景、历史与现状进行全方位解读（《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大足石刻》）。也有从学科构

建实践者的角度出发，从大足学的时空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等多方面给予其进行阐释与说明的（《“大足学”的构建与实践》）。也有以敦煌学发展历史作为参照，结合大足石刻研究学术史的回顾，进而对大足学的构建可能性进行探讨（《从敦煌学的发展看大足学的建构》），

第二部分“石窟寺艺术与美术考古”，立足学术前沿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探讨及学术成果的介绍，如以考古发现的佛教石窟寺遗存为线索，展现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与嬗变的过程（《中国佛教艺术源流概述》）。如通过考古发现来揭示西藏西部佛教遗存在佛教传播史和佛教艺术史上重要地位与作用（《西藏西部佛教美术》）。以“长安样式”的形成与传播认识唐代佛教艺术风格的成因与特征，对巴蜀唐宋时期佛教艺术源流问题的探讨（《巴蜀地区唐代佛教造像与长安样式》）。如从石雕工匠的研究视角出发，去探讨中国艺术的地域传统与艺术商品化问题（《石雕工匠书写的艺术史》）。也有从中国传统艺术的复古与拟古角度，认识地域艺术传统与文化交流问题的探讨（《六世纪时绵阳汉阙被再次使用》）。还有对汉代陶灯和三段式神仙镜之西王母图像地域特征的考察，以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解决器物的年代、地域等基本问题以及文物的鉴定和复原（《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的地域特征》）。

第三部分则是演讲嘉宾以自身多年石窟寺考古与研究经验出发，对佛教石窟寺考古在理论、方法和在四川地区的具体实践做了总结与介绍（《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石窟寺田野考古方法探索》）。

希望通过“大足学讲堂”的组织与成果的出版，搭建起一个高水平交流的学术平台，促成学术交流与互动，亦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更希望通过优秀学术研究成果的汇聚，能够有效构建学科基础，以推动学术研究的持续向前发展，努力集聚跬步，以期能致千里。

秦 臻

2014年3月16日

CONTENTS / 目 录

壹 大足石刻与大足学

3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大足石刻	黎方银
24	大足学的构建与实践	王天祥
42	从敦煌学的发展看大足学的建构	龙 红

贰 石窟寺艺术与美术考古

67	中国佛教艺术源流概述	李裕群
88	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术	霍 巍
117	巴蜀唐代佛教造像与长安样式	罗世平
140	石雕工匠书写的艺术史	秦 臻
162	复古与地区创新——六世纪时绵阳汉阙被再次使用	魏离雅
179	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的地域特征	苏 奎

叁 田野实践与方法

199	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理论和方法——以安岳圆觉洞为例	雷玉华
219	佛教考古调查的对象与方法——以夹江千佛岩为例	于 春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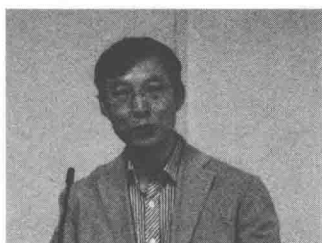
壹

大足石刻与大足学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大足石刻

对于大足石刻，大家都不陌生。在下一个环节的教学中，学校还要组织大家到现场参观考察。百闻不如一见，百讲不如一看，我想，通过参观大家对大足石刻一定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我只是为了配合大家的现场参观，作一个辅助性的讲座。重点放在如何解读大足石刻的重大价值和如何维持其重大价值这两个方面。为此，我主要讲五个方面的问题：



黎方银 大足石刻研究院

- 一、价值声明：世界遗产标准下的大足石刻
- 二、西佛东渐：世界石窟视野下的大足石刻
- 三、艺术涅槃：宋代文化背景下的的大足石刻
- 四、尘埃落定：三教思想影响下的大足石刻
- 五、任重道远：国际保护理念下的大足石刻

一、价值声明：世界遗产标准下的大足石刻

对于每一处列入世界遗产地的重大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其都有一个认定，这是向全世界发布的，被称为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这是一个官方正式声明，如果要更改，必须经过主权国家上报，世界遗产委员会审定。需要说明的是，在网上我们现在查到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大足石刻的认定是这样说的：“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实际上，这个认定不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发布的大足石刻突出普遍价值的正式声明，而是对大足石刻的一个一般性概述，很多人把它弄错了。

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的、完整的大足石刻突出普遍价值声明包括摘要、适用的价值标准、完整性、真实性、维持突出普遍价值所必需的管理和保护要求等五部分。

（一）摘要

位于中国重庆市，始建于公元650年的大足石刻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

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是公元9至13世纪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代表作，是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三教”和谐共处和空前的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实物例证。遗产地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及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

（二）适用的价值标准

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基于标准（i）、（ii）、（iii）：

（i）大足石刻美术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ii）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密宗，与中国的道教和孔子儒家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

（iii）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大足石刻这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

（三）完整性

大足石刻保存完整，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者之一。已经划定的遗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为完整保存这些造像本身和所依存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历史信息所必备的各种要素提供了保障。

（四）真实性

大足石刻历史上未遭受大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完整保存了雕刻时代的特点及价值。在现代的保护维修中，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其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对造像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注重其周围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保持了历史的规模、原状和风貌，从而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其作为宗教艺术的世俗信仰、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功能的真实性。

（五）维持突出普遍价值所必需的管理和保护要求

国家制定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遗产保护法律，以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重庆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确保了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被损害和削弱。当地政府把大足石刻的保护管理纳入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满足了大足石刻保护管理的需要。

依据《大足石刻保护总体规划》，通过建立和完善大足石刻监测系统，科学、严格的维修保护计划和管理措施，以及具备专业素养的保护人才队伍，全面开展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工作。

在这个声明中，其中适用的价值标准是其核心。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价值标准，我接着讲下面的问题。

二、西佛东渐：世界石窟视野下的大足石刻

说到石窟艺术、佛教艺术，我们的思绪便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阻隔，油然想到天竺之国——古印度。这并非缘于我们的想象过于丰富，而实在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和了解到的佛教及其艺术，与古代印度有着血肉的联系。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不在这里探讨佛教艺术的起源及其“西佛东渐”的传播过程，而只是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石窟的介绍，来分析和了解大足石刻在其中的时空地位。

在众多的佛教艺术中，石窟艺术无疑是其最为精粹的部分。所谓石窟就是开凿在山崖石壁之上的洞窟，是佛教寺院的一种特殊建筑形式，供僧人们生活 and 修行用。

当时，石窟寺大多模仿平地的木造寺院和僧院而建，因此无论是佛殿还是僧院，都在石头上仿照木造建筑而雕刻出柱子和梁。石窟佛殿窟内部有两层楼高，天顶呈圆筒形，还模仿木造建筑雕刻了椽子。石窟本来在构造上不需要这些东西，但为了美观，为了让它们更像木结构建筑，整个石窟从走廊到佛殿，都使用了这种仿木雕刻。

建造石窟有几个好处：洞窟冬暖夏凉，最适宜静居；早期石窟凿于僻静之所，人迹罕至，环境雅致，宜于禅修；开凿石窟寺较之用砖石建寺院节省费用；石窟较坚固，不易损坏，能长存于世等。

印度佛教石窟主要开凿于公元前1、2世纪，最盛之时多达千余处。公元前1世纪左右，随着佛教的对外传播，石窟也从古印度迅速向域外传播：南面传入东南亚，形成具有小乘佛教特色的石窟艺术；北面传入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形成具有中亚特色的石窟艺术；东面越过葱岭，在公元3世纪左右传入我国新疆的拜城、库车等地，再传入到甘肃的敦煌、山西大同的云冈、河南洛阳的龙门，转向四川的广元、巴中、安岳、大足，以及云南剑川、杭州飞来峰等地，在全国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中国石窟艺术网（图1）。

截至目前，在全世界几百处石窟中，仅有8处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印度3处，阿富汗1处，中国4处。

1. 阿旃陀石窟

列入时间：1983年。阿旃陀石窟（图2）是印度著名的佛教石窟寺，位于印度孟买市东北。石窟始凿于公元前2世纪，7世纪后终止开凿。8世纪后逐渐被人忘却。这处石窟早年废弃后逐渐被泥土流沙和岩覆盖湮没，直到19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1819年，马德拉斯军团的一连士兵在这里演习时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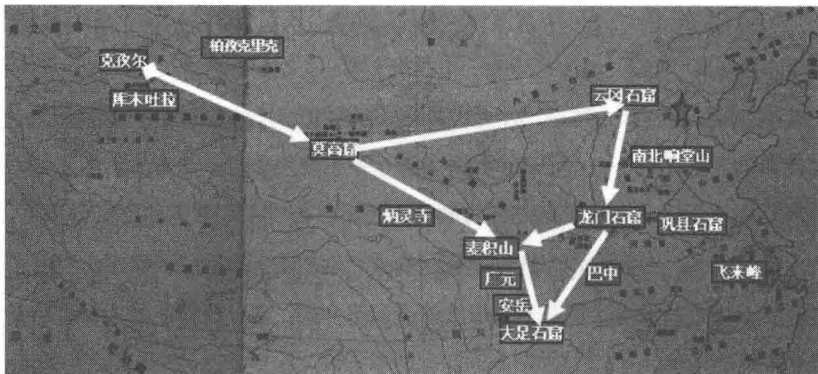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主要石窟分布图

这处石窟，1824年英国人亚历山大参观后才开始向外界介绍这座石窟。

石窟开凿于长550米，距地面10~30米不等的崖面上。现存洞窟29座，位置略有高低错落，大体上是横向的一列，以中央诸窟年代最早。除5个窟为供养信徒礼拜的佛殿窟外，其余者是僧房。

阿旃陀石窟的建筑和雕刻非常精美，其中以笈多时期开凿的第19窟为代表。阿旃陀石窟更以其壁画艺术著称于世。早期石窟表现的是小乘佛教题材，以本生故事画为主，佛的形象有用象征手法表现的。壁画形象生动，笔法洗炼。

2. 埃洛拉石窟群

列入时间：1983年。埃洛拉石窟群（图3）位于印度奥兰加巴德市。开凿于公元4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主要是4—7世纪）。在1500米的斜坡之上共建34座石窟，规模宏大。是古印度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三教”艺术的杰作。

3. 埃勒凡塔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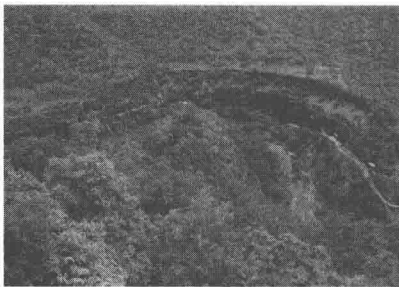
这是一处印度教的石窟，列入时间：1987年。位于印度孟买附近阿曼海的一座岛屿上。开凿于公元450年至750年。以两条主轴线和主洞为中心，布局成一个宏大的石窟群，故该岛称为“石窟城”神殿。

岛上共有5座石窟。埃勒凡塔石窟通常特指第1窟，约开凿于8世纪。埃勒凡塔石窟是一座凿空山岩的湿婆神庙，形制类似埃洛拉石窟第29窟。正门北向，东西亦开入口。窟内立柱林立的大殿平面呈十字形，边长约40米。

图2 | 图3

图2 阿旃陀石窟外景

图3 埃洛拉石窟群



4. 巴米扬石窟

列入时间：2003年。巴米扬石窟（图4）位于今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城北兴都库什山区。公元3—7世纪开凿的佛教石窟。8世纪初随着当地的伊斯兰化，巴米扬石窟遭到了极大破坏。共凿有大小石窟约750个，是古代巴克特里亚文化宗教发展的杰出代表，也是2001年震惊世界的塔利班炸毁两尊巴米扬大佛悲剧的见证。

5. 敦煌石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一个最主要的枢纽。由敦煌出发，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去古都长安、洛阳，步入中原大地。西出阳关，就意味着出国了。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先生的论说充分说明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敦煌艺术具有的最广泛的包容性。

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敦煌石窟是敦煌地区石窟之总称，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市的莫高窟。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8年，位于敦煌市区东南鸣沙山的峭壁上，东隔大泉河与三危山相望。据记载，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僔的僧人来到莫高窟前的大泉河畔，临近傍晚时分，乐僔突然看到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他感悟到这儿是佛地，便在崖壁上开凿了一个佛窟以作供养，从而翻开了莫高窟历史的首页篇章。乐僔看到的这种景象现在也常能看到，这是因为三危山石质呈暗红色并夹杂有云母，夕阳的红光从平坦的戈壁滩上毫无遮挡地照在山体上，而这时莫高窟前因背阴已显昏暗，人们从这里东望三危山，整座山通红通亮，蔚为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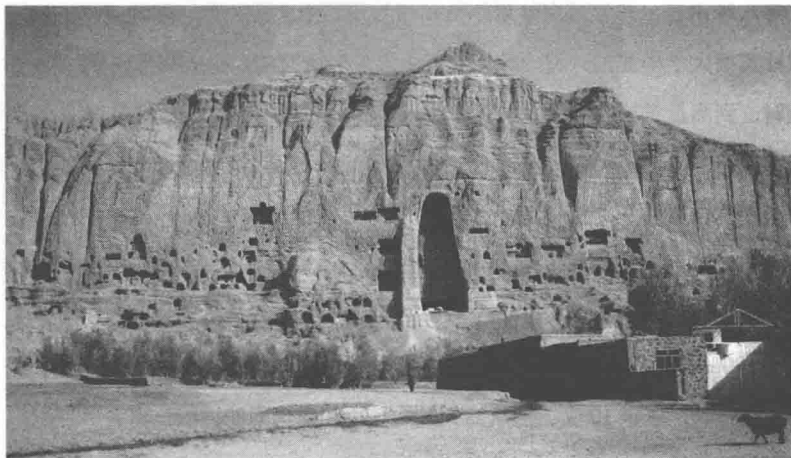


图4 巴米扬石窟外景



图5 王圆箓像

此后在南北长1600余米的崖壁上，分布着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洞窟492个，彩塑2400余身，壁画45000余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建筑5座，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寺。

藏经洞的发现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藏经洞的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敦煌，已是一片荒凉。当时，这里住了一名道士，即王圆箓（图5），湖北

麻城人，因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云游至敦煌。其时敦煌洞窟多为流沙所淹没，王道士因设愿披沙开洞。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 etc 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藏经洞大劫难

藏经洞发现后，英、法、日、俄等东西方探险家闻讯接踵而至，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大量的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这些国家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成为中国人永远的遗憾和悲愤。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1）斯坦因敦煌劫宝

斯坦因（图6），匈牙利人，会匈、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梵文等八种语言，并学过克什米尔话和突厥语，中文会一点。1883年21岁在德国杜宾根大学毕业后，到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研究东方语文和考古学。在服役时，到测量学校学习测量地形和绘制地图。后来研究古代钱币并前往印度作考古旅行，熟悉了当时外界尚不甚了解的犍陀罗艺术风格。1889年，他被任命为印度拉合尔东方大学校长。此后，他一直在中亚地区进行考察。

斯坦因分别于1900、1906、1913—1916、1930年四次来我国西北进行考察。这里，我们要介绍1906年的第二次考察期间对敦煌千佛洞宝宝藏的劫夺。

1906年，第二次远征，目标楼兰遗址，3月首次到敦煌，蒋孝琬（师爷），不知藏经洞，原定10天，后从商人处知。小和尚再未能进洞，离去。

5月返敦煌，庙会，怕众怒，未下手。几天后再到敦煌，蒋师爷周旋，使王圆篆终于打开了藏经洞，让斯坦因研究。不断恭维，许诺，七天七夜挑选，共24箱写本和5箱绢画、刺绣等艺术品，雇了十匹骆驼运输。1914年，他再次到敦煌掠走5箱写本，两次共掠走文书5000多件、遗物一万多件。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实惠与极高的声誉。

（2）伯希和劫宝

伯希和（图7），中学毕业后进入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900年到北京，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藏书，骗购了一批古籍和文物。

欧洲“考察家”“探险家”涌入我国西北窃取大量珍宝使他十分眼红，1906年6月伯希和率团（3人）前往中国。

在到敦煌前，他们在库车考察了八月，收获颇丰。这时，不知藏经洞，仅计划去敦煌拍照。偶然知藏经洞。

1908年初，到敦煌。一个月后进洞——惊得呆若木鸡——挑了三个月，分为两堆——付500两白银白（90英镑）——用船运走——同进对所洞窟拍照——6600卷全部藏巴黎国民博物馆——比斯坦因更好的东西——进行研究。从军——支持盟军——1945死。

从1906—1914年间，盗劫藏经洞遗书的还有日本、俄罗斯的一些探险家、冒险家。此后，再没有一个外国考察家从中国的西北盗走任何东西。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人停止了他们的远征。一战后，中国混战，美国人决心碰碰运气，于是在1923年，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杰恩，组成了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



图6 斯坦因像



图7 伯希和像